

张明悟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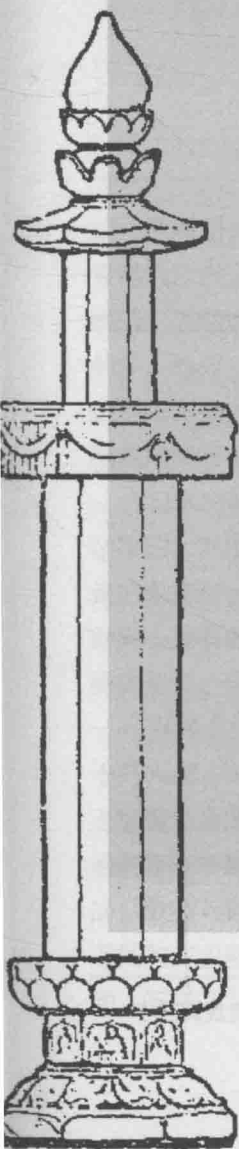
辽金经幢研究

在全国各地寺庙中仍可见各个朝代遗留的、大小斑驳的石柱
其上镌刻的文字、图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向后人无声诉说着一个个佛教信仰的传奇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辽金经幢研究



经幢是佛教密宗进入中国后独特产物，
一般由石刻而成，个别有铁铸，
多为八角和六角，圆柱形和圆鼓形罕见，
上面刻以佛顶尊胜陀罗尼为主的各种密宗陀罗尼。
经幢的建置自唐朝开始普及一直延续到明清。
唐代是树立经幢的高峰期，
而异域的辽金时期更是风靡，
经幢的形制、内容、建置目的要比唐宋复杂得多，
对于研究佛教史尤其是密宗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经幢研究 / 张明悟著.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046-6448-8

I. ①辽… II. ①张… III. ①石幢—研究—中国—辽金时代
IV. ①K877.4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8443号

责任编辑 余 君
责任校对 孟华英
责任印制 张建农

出版发行 科学普及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 话 010-62103125 62103349
传 真 010-62173081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印 刷 北京长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2.25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046-6448-8 / K · 131
定 价 32.00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罗 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密教研究是我国佛教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之一，直到1987年法门寺塔地宫出土舍利宝函上的完整曼荼罗图案呈现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清楚、透彻地说明它们的内容，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的密教研究才开始起步。然而，限于史料的缺乏和传统见解的束缚，至今很多论著仍然笼统地告诉读者，在“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之后，密教走向衰落和灭亡。历史的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日本密教的始祖空海和最澄，都是在不空圆寂之后数十年才来唐朝学法的，回国之后忠实地传授他们在唐朝学到的密法，分别创立体系完备的东密和台密。如果不空之后的中国密教衰落，如何能有至今仍然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密教呢？这是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可惜最简单、最真实的事情，却常常最容易被忽视。

事实上，南诏、大理和辽金时代，以及钱氏统治的吴越国，密教都十分兴盛。2001年，我在研究云南省剑川石窟的大日遍照佛与八大明王造像组合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唐时期产生的密教“伪经”在不空之后的唐朝密教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对南诏、大理佛教影响极大；此后，又从敦煌写经中发现唐朝晚期成书的密教“伪经”《金刚峻经》在水陆道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孵化作用。由此认识到，不空之后的密教“伪经”，是唐朝密教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甚

至可以说：有别于印度密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唐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这些密教“伪经”构成的，传自印度的密教经典和修法，与中国密教僧人创作的“伪经”共同形成了唐密。

汉传佛教中的所谓“伪经”，是指不是根据印度梵本和中亚胡本翻译出来的、而是由中国僧人创作、但仍然以翻译经典面目出现的佛经（少数“伪经”甚至不以翻译经典的面目出现），历来是被正统佛教摈斥、弃绝的对象，研究佛教的主流学者也大多轻贱它们。然而，现存的正宗佛经，其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是像它们标榜的那样出自释迦牟尼佛之口，而是由后世的印度和中亚僧人以释迦牟尼的名义造出来的。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真正属于释迦牟尼亲口所说的很少，需要专家们仔细分辨，而且多数在戒律经典中。

在佛教研究中，分辨“伪经”既是有意义的工作，又是无意义的工作。从学术上、对于准确认识佛教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说，分辨“伪经”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从信仰来说，分辨“伪经”是无意义的工作，因为严格地、就“伪经”的原意而言，大多数佛经都是“伪经”。

从汉传佛教的密教“伪经”研究唐朝密教的工作，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今后需要缜密地进行。现在，我欣喜地读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明悟先生的专著《辽金经幢研究》。这是继吕建福先生的《中国密教史》之后，研究汉传密教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是密教研究领域的一项出人意外、非常难得的突破性进展，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向读者推介此书。

研究辽金经幢，不可避免要涉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刘淑芬先生早已发表了名篇《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近年来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王振国先生也出版了《龙门石窟与洛阳佛教文化》一书，其中有较大篇幅研究洛阳地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本书作者则以自然科学史研究者擅长的分类方法，首先区分出辽金经幢的7种分布地点，接下来，他又深入研究现存的所有辽金经幢的题记，根据其上镌刻的建幢人的身份和目的把它们分为9种。此外，作者还特别提请我们注意度亡幢经常被人误认为墓幢，几乎有将近一半度亡幢可以从墓幢中分离出来。

作者对于经幢的分布地点和幢主身份及功能所作的上述分类，不仅比以往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注意发掘经幢蕴含的精神内涵和辽金燕京民众的内心世界，指出：辽金经幢相比于唐代来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墓幢极其流行。陀罗尼经幢之所以如此流行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能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孝道结合在一起，帮助先亡祖宗脱离地狱之苦、往生极乐，是尽人子孝行的一个基本要求。经幢一旦和孝道联系在一起，那么建幢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一种道义上的承担和必然，不建幢则可能会被视为不孝——“苟未能为幢于坟，则是为不孝也”。在当时的社会中，建墓幢已经成为一种尽孝道的象征，建不起经幢的人则背负上不孝的心理负担，以至于寝食难安。他还专门分析了北京地区最矮小的、无比寒酸的一座辽代经幢上的文字，让我们注意：贫穷的女幢主李阿牛希望每一次下雨时丈夫的魂灵都能被漫天雨滴所浇灌，让他前世今生的罪业都被免掉。我认为，人文关怀是本书的一项重要成就，它让密教研究超越了佛教研究的狭窄领域，进入辽代社会思想、特别是下层社会风尚的新天地，而这是资料极其匮乏、成果寥若晨星的学术园地。仅就这一点而言，本书便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当然，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辽金经幢的陀罗尼版本变化，并追寻变化的原因。作者首先指出，辽金经幢上的佛顶尊胜陀罗尼受到了唐宋的影响，同时自身又有强烈的特性。辽代中早期的经幢基本都只刻佛顶尊胜陀罗尼，但到了辽道宗晚期，佛顶尊胜陀罗尼在经幢上独大的格局迅速改变，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短而小的陀罗尼，四百多字的佛顶尊胜陀罗尼越来越少。金代经幢上佛顶尊胜陀罗尼仅占三分之一，而辽早期和中期则占几乎百分之九十。

作者几乎把目前所有辽金拓片和实物经幢上的佛顶尊胜陀罗尼进行了比较和辨析，发现至少有9个版本。在这9个版本中，有4个较为流行，其余5个比较少见。作者还注意到，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上，著名的辽金时期房山石经对社会平民的信仰影响不大，经幢和石经完全是两个版本系统，彼此之间很少有交融和影响。作者经过仔细的校勘，发现辽代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从辽早期到辽中期是不统一的。但是到了辽代道宗朝晚期则突然统一起来，但是统一的原因并不能从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的研究中得出。于是作者把目光投向其他的密宗陀罗尼，又

发现了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统一的同时，经幢其他方面也发生突变。

这一突变的主要特征是梵字幢的爆发和其他密宗陀罗尼的流行。本书特别注意到，从辽代早期一直到道宗朝晚期的150多年里，仅见一座汉梵对译的陀罗尼经幢，但是从辽晚期乾统年间开始，梵字幢突然流行。与此同时，陀罗尼的种类也开始突变。辽代早、中期几乎所有经幢都镌刻汉字的佛顶尊胜陀罗尼，但是从乾统年间开始，佛顶尊胜陀罗尼一统天下的格局迅速发生变化，以大准提和智炬如来为首的陀罗尼出现得越来越多，新增的这些陀罗尼的版本还是完全统一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金代末期。作者发现，所有这些变化，均和辽代高僧道殿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有关。

所以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辽金经幢的陀罗尼在乾统年间突变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影响。《要集》中对于密宗修持的核心理论就是提倡梵字陀罗尼和推广大准提修持仪轨，而这些均在辽乾统年间之后的经幢上开始大量出现。而且《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一些独一无二的陀罗尼译本也均出现在从此之后的辽金经幢上，这是两者有相关性的铁证。

显而易见，乾统年间以后辽金经幢的变化，全部是遵循《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体系进行的。为什么此书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本书作者继续追寻，发现从辽道宗大康元年开始，辽国疆域天灾不断，到了大康五年，在天灾频仍的情况下，深信密法的辽道宗谋划请沙门设坛修持陀罗尼弭消天灾，“遂得禾登九穗，麦秀两岐；宝祚恒安，兆民永乐”。《要集》特意指出，辽道宗“坚持密咒，聿获神功”。

这样一来，辽道宗晚期，社会的佛教信仰方向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密教突然变得极为流行，本书作者推定这一转变大致始于大康三年皇帝下旨令密教高僧觉苑进呈《大日经义释演密钞》。而《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正是在辽道宗大力崇奉密教的氛围中成书的。

道殿把显、密教的精华义理各自阐述，并给予佛理上的综合和圆融，最后推出了大准提修行法门。他大大简化密教的修程序度和难度，认为可以忽略严格的持戒和复杂的曼荼罗，只需持诵大准提陀罗尼即可，因而准提法在元、明、清迅速普及。这样，道殿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不仅仅影响了辽金经幢，也影响了辽金乃至以后的密宗佛教。

1992—1995年，我在闽南地区调查天地会的历史起源，那里民间信仰准提佛母之广泛、深入和虔诚，让我大开眼界，而准提佛母像（闽南民间称为“十八只手观音”）最上方的左、右两手中举持着的日和月，竟成为天地会“反清复明”的秘密标识，这更让我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真知。但是，将近20年来，我一直想知道、但一直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准提佛母在中国古代社会能够产生如此久远和巨大的影响（闽南是大陆地区传承汉族古文化最丰厚的区域之一）。直到拜读本书，我才茅塞顿开！由此进一步认识到，辽代决非杨家将系列文艺作品展示的那样野蛮、落后，而是文化高度繁荣发达的王朝，并且能够创造出长期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产品。

本书考证出辽金经幢从辽晚期乾统年间开始的突变及其与《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发现辽道宗时期的天灾与皇帝崇奉密教之间的关系，因而《要集》很快得到辽国上下的普遍信奉。我认为，这是本书最重要的贡献，同时是中国密教研究的一项重大的进展。

研究至此，成果已经斐然可观，但是作者并未停步，又把目光投向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资料，发现在很多辽晚期的墓葬中，密教流行的证据也非常明显，并且和经幢的变化步伐高度一致，都受到《要集》的直接影响。首先的表现是附有梵字的文物在墓葬中突然出现。辽乾统年间前后，很多辽墓的棺材上都书写梵字的各种陀罗尼。此后，《要集》版的“智炬如来心破地狱陀罗尼”等更以多种形式直接出现在墓葬的不同位置和器物中。这样，继唐代考古学之后，密教研究又进入辽代考古学领域。

此外，作者还注意到辽金经幢上的佛顶尊胜陀罗尼有其翻译上的地方特色。辽代译经主要发生在燕京地区，而燕京语音和唐宋的长安、洛阳及汴京是有差别的，因而当地的僧人们根据本地发音对唐宋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做了一定修改。这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宝贵资料，本书为语言学家们指认了经幢上的这些稀有珍品。

美中不足的是，本书的上述分类中忽略了房山云居寺位于原南塔北侧的两种经幢：《续秘藏石经塔记》和造像幢。《续秘藏石经塔记》非常特殊，身为幢，顶为塔，雕刻的不是密教经咒，而是续刻房山石经的碑记和刻经目录，与本书的研究范围不尽相同，但它是辽代经幢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不可不提。如果在相关章节结尾或注中说明，便尽善尽美了。

长期以来，中唐以后的密教资料未经过系统梳理，比较杂乱，并且散失较多，需要与存在于广阔地域和多种领域的实物资料对照研究，才能逐渐理出头绪。但本书作者能够深入书海，遍查拓片和文献；上山下乡，艰苦地进行田野调查，最终获得重大突破，为专业工作者做出示范，可钦可敬！

2013年10月6日



前言

唐高宗仪凤（676—679）年间，从印度传来一部佛教梵字经书，武则天视如至宝，深藏皇宫。在僧人求恳下，经书被送出大内，公示于天下。经过几代高僧翻译后，此经书迅速传遍华夏，并引发了民众信仰的狂潮。这部经书就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从此以后，整个唐代的皇帝和中国密宗的代表人物开元三大士都对此经极为推崇。唐代宗在大历十一年（776）甚至下令全天下的僧尼“每日须诵尊胜陀罗尼二十一遍”。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人们并不满足于持诵该经书，而是把这部经或者其中最关键的陀罗尼镌刻在高大华美的六角或者八角的石柱上，用以敬仰跪拜，希冀赐福生者并超度亡灵众生。从此之后的一千多年，整个华夏大地的几乎所有寺庙，还有很多墓地、交通要冲和个人私宅都建起了镌刻这部经书的各色石柱。这种石柱就是密宗陀罗尼经幢。直到今日，在中国各地寺庙中仍可见各个朝代遗留的、大小斑驳的经幢，其上镌刻的文字、图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向后人无声诉说着一个个佛教信仰的传奇。这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中国寺庙建筑的一大特色。

经幢是佛教密宗进入中国后的独特产物，一般由石刻而成，个别有铁铸，多为八角和六角，圆柱形和圆鼓形罕见，上面刻以佛顶尊胜陀罗尼为主的各种密宗陀罗尼。经幢的建置自唐朝开始普及一直延续到明清。唐代是树立经幢的高峰期，而异域的辽金更是普及风靡。除了佛顶尊胜

陀罗尼，后期的经幢出现了越来越多其他大小种类不一的咒语，这些咒语都是由传自印度的梵文佛经所译。此外，一般经幢还会刻上一段题记，讲述建幢的目的、时间以及建幢人姓名，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

历史上对经幢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晚，直到清代乾嘉时期的考古潮中才有学者们陆续关注。乾嘉著名学者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孙星衍的《寰宇访碑记》和《京畿金石考》，嘉庆二年（1797）阮元、毕沅合编的《山左金石志》，嘉庆十年（1805）王昶的《金石萃编》等书中均已收入经幢的信息。晚清时期的研究则进一步发展，道光年间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和道光四年出版阮元编的《两浙金石志》记载了更多的经幢资料。光绪末年，叶昌炽收录了几百个经幢的拓片，并在其金石著作《语石》中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虽然自清中期开始，学者们开始有所重视经幢，但相关的研究一直到现在还相当不足。最近才有台湾中研院历史研究所刘淑芬先生的专著《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问世，此书属于第一本研究经幢的专著，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全书是从历史全局角度上进行的总括性探讨，并没有做更为具体深入的研究，有简略之憾。新近又有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王振国先生对河南洛阳地区的唐宋经幢做了一些具体的研究。不过前面这些探讨对于整个经幢领域来说远远不足。首先，因为全国经幢数量庞大，从南到北，历朝历代均建有大量经幢。随着近年陆续出土和人为盗掘毁损，中国现存经幢的数量和保存情况一直没有精确统计。其次，时间和地域的差别也非常大，从唐至宋、辽、金，从塞外、中原乃至江南，不同时期所建立的经幢差别非常大，这也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而且历来学者们对经幢的研究仅仅着眼于叙述立幢事由的题记，而对作为经幢主体的陀罗尼则基本忽略掉，仅仅把经幢作为建筑史和艺术史上的文物，忽视了其承载佛教密宗祈祝的主要目的。这样就丧失了大量关于佛教的历史信息。另外，受主流史学界的影响，学者们涉足唐、宋经幢较多，而对辽、金经幢研究得很少。但就目前现存文物来看，辽金时期是继唐以后建造经幢的第二个高峰，而且建造经幢在当时社会各阶层非常普及，建置形制和目的及内容都要比唐宋复杂得多，这对于研究中国佛教史尤其是密宗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目前尚缺乏认真系统地研究。

以往一些涉及辽金经幢的专著都比较粗略，如前面提到的孙星衍的《寰宇访碑记》、《京畿金石考》（两书仅仅是经幢的名录）和叶炽昌的《语石》等等。民国时期罗振玉之子罗福颐所编的《满洲金石志》记载了一些东北地区的辽金经幢。当代著名辽史专家陈述所编纂的《全辽文》，对一些辽代经幢上的题记有所记载。近年向南的《辽代石刻文编》才开始对辽代经幢的题记有比较详细的收录，但是陀罗尼部分则没有记载。

针对以上现状，本书以辽金经幢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题记分析其建幢的原因，还有建幢位置、年代变化、建筑材质、建幢人的祈祝目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等，结合辽金史，再现千年前辽金时期民众的物质生活和内心世界。其次，对于以往无人关注的经幢上的密宗佛教陀罗尼进行深入解读，探讨其变化的规律，并揭示一些重要的发现，然后分析这些变化的历史、宗教背景，以期从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来对辽金史给予重要的补充。

研究辽金经幢的重要意义在于两大方面。

首先，对于辽金史研究有着无可替代的补充作用。辽金曾覆盖了中国半个版图，绵延时间三百多年，创造了灿烂而丰富的文化，其风俗时尚一直影响后代，于今仍有痕迹可见。但是由于主流史学观的影响，世人对辽金缺乏必要的重视。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辽金史料非常缺乏。目前的突破皆是从现存的考古发现和文物研究入手，所以辽金石刻是补充辽金史的最重要的文物。而经幢则又在辽金石刻中占相当大的部分，其中蕴含的历史信息是海量的。从北京这座城市来说，一部辽金史也就是北京建都史。辽金是北京城最关键的历史时期之一。北京尽管在西周初年就已经建立城池，但此后一直是中国北方边陲城市，在整个华夏政治、文化上的地位并不重要。直到辽金时代，北京因成为一国之都，方在整个北中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后来的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辽金是北京的鼎都之代，方兴之朝。但由于现存辽金史的简略，对于北京建都伊始这三百年的历史研究尚有大量空白。而辽金经幢上面所蕴含的大量信息涉及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恰好能补充和校核现存史料之缺，对于研究北京的历史无疑具有巨大价值。

其次，从佛教史的角度上说，经幢是佛教密宗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

由于唐密在中土断续千年，今人对其认识相当浅薄，而辽代密宗恰能上承唐代纯密，并开启无上瑜伽乘密教，兼兴义学，同时提倡显密圆通，是中国密宗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辽国在密宗的影响下建立了数量众多的经幢。相比于唐宋时期，辽金经幢有显著的时空特点：一，建筑上形制各异，更贴近平民社会，目的更多样化，其中蕴含着辽金时代大量重要的社会信息；二，辽金经幢的陀罗尼组合非常复杂，既有早期杂密和唐代纯密的影响，也有准提法门的信息，是关于佛教研究的重要资料，并且与当时的汉语音韵有很大相关性。所有这些内容至今仍没有被发掘，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当然，对任何历史事物的研究都不能孤立进行，必须把这一事物放在其历史背景中来考量。纵观历史上的经幢，主要集中在三大地域：唐代的长安、洛阳和辽金的燕京城（北京）。辽分五京，燕京城当时称“南京”，为五京之一，辽国的政治中心则在中京（今天内蒙古宁城）。为何辽金的经幢都集中在燕京及周边地区呢？这先要从辽南京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说起。



「目 录」

序言 / 罗炤	3
前言	9
第一章 幽燕佛国	1
第一节 辽金之鼎	2
第二节 辽南京——幽燕佛国	9
第三节 房山石经	17
第二章 唐辽密宗传承及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	23
第一节 密宗概述	24
第二节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推广	31
第三节 经幢的结构及起源	40
第三章 经幢题记解读	43
第一节 辽金经幢的形制	46
第二节 经幢分类	48
第三节 辽金燕京先民的精神世界	57
第四章 佛顶尊胜陀罗尼版本流变	75
第一节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译本	76

第二节	辽金经幢几大版本	82
第三节	演变过程分析	95
第五章	其他陀罗尼演变之研究	101
第一节	辽金经幢陀罗尼突变的现象	102
第二节	线索的分析	105
第三节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修持要点	109
第四节	经幢陀罗尼的具体变化	113
第五节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成书年代	115
第六节	辽道宗晚期的密宗盛行——大康三年的转折	119
第六章	金盏经幢之解读	133
第一节	佛顶尊胜陀罗尼	136
第二节	大准提陀罗尼仪轨组合	142
第三节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文殊五髻真言系列	148
第四节	经幢功能	152
第五节	所属寺庙建置解析	161
结 语		171
参考文献		175



「第一章」

幽燕佛国

经幢自盛唐开始在中国兴盛，之后在宋、辽、金时期出现得最多。就中国北方来说，辽金时期的经幢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之优势。而辽金两朝占据北方中国三百多年之久，地域广大，但是经幢的分布又以今北京地区及周边地区最为集中，占有一多半的数量。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辽金经幢如此之多？其次是因为什么北京及其周边最为集中呢？本章主要阐述辽金经幢盛行的历史背景，同时解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节 辽金之鼎

为什么北京拥有大量的辽金经幢？这当然和北京在辽金之时升为国都有关。但是，北京有三千年的建城史，为什么建都的时间由辽金才开始？其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一切要从北京的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说起。因为任何一个城市的早期兴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地理。

1. 独特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来说，北京是一个诸多地理区域的交会点。她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燕山山前的晚更新世冲积扇平原上，西拥太行，东邻沧海。从地势来说，北京处于中国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交界处，是山区和平原的分界线。从山脉走势来说，中国一横一纵两条最大山系：昆仑山—阴山—燕山山系和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就在北京交会。从作物带分布来说，她处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上。从文明来说，北京北接西北草原、东接东北平原、南瞰华北平原，所以处于游牧文明、山地文明、和农耕文明三大体系的关节点上。从上古民族交流来说，北方的山戎和东胡，东北的通古斯族系、华北平原的华夏古族、西部高原的狄族各支、东边滨海的夷族，各种民族在这里交会和战争。华夏古国的各种文化都大气磅礴地在北京一带交会演变成各种战争和文化冲突，因此北京注定就不是一个平凡之地。北宋范镇的《幽州赋》对北京的地理形势进行盛赞：“虎踞龙盘，形势雄伟。以今考之，